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

莫斯科的
岁月 1956|1958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莫斯科的 岁月

1956
1958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
达洲 代军 丽敏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VELJKO MIĆUNOVIĆ
MOSKOVSKE GODINE

1956/1958

IZDAIE

SVEUČILIŠNA NAKLADALIBER-ZAGREB 1977

根据萨格勒布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宁成春

莫斯科的岁月

(1956—1958)

[南]韦利科·米丘诺维奇

达洲 代军 丽敏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1印张 505,000字

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58,000

书号 3002·221 定价 2.05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韦利科·米丘诺维奇在南斯拉夫长期担任外交事务方面的领导工作，并于一九五六到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九到一九七一年两次出任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

本书以日记的形式记述了南苏关系正常化以后，作者在一九五六到一九五八年任驻苏联大使期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事件，特别是南苏关系的变化情况。叙事生动，内容丰富，有分析，有评论，既是一本回忆录，又是一本有关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书籍。该书在一九七七年出版后，立即引起世界舆论的重视。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向〈文学语言〉杂志发表的谈话》一文，发表在南斯拉夫杂志《文学语言》第100期上。作者在这里对本书的写作目的作了详细的说明，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作者的想法和书中涉及的一些事件的背景。我们征得作者本人的同意，作为中译本的附录，供读者参阅。

作者在出版中译本时，对原书内容作了少量的改动。

一九八〇年三月

作者的话

一九五六年三月初，在我被任命担任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之后，我开始就我的新工作做笔记。同月底，我一抵达莫斯科，就日复一日地把我在新职务上所遇到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首先是南苏两国关系中所发生的事情，都记载下来。这样，在我第一次赴苏任职的将近三年时间内，就记下了大量的笔记。

对这批材料的整理工作只是把二十年写下的文字压缩一下。在这上面花的时间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得多得多。这件事拖延了很长时间，因为我得学会用左手写字，一九七四年七月初我突然得了一场无法痊愈的病之后，我的右手永久地丧失了。

关于这里谈到的极大部分问题，也就是说，关于南苏关系的发展，我国公众是及时地了解的。这本书要做的是，提出有关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间南苏关系发展的个别事实。在我看来，这既是《莫斯科的岁月》这本书的好的一面，又是这本书的不好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可能在于书中所谈的一切都具有文献的性质。消极的一面可能在于由于追求翔实而陷于罗列事实和枯燥地列举所发生的事件。

这里谈的是很久以前所发生的事情，这些事件的大多数参与者已经不在人世，尽管如此，局势以及南苏两国那个时期的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仍然保留自己的根本特点。南苏关系今天跟以前一样，仍然是我国公众和国际上瞩目的中心。从种种情况来看，南苏关系中的一些根本问题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仍将有其现实意

义。南苏两国间合作的程度和形式不断地经历变化，诚如整个国际关系经历变化一样。我们两国的关系在逐步取得进展，在这方面，今天的状况同这本书里所谈到的二十年前的状况已大为不同了，不过南苏关系的基础依然没有改变。

我相信，我们年轻一代有兴趣于了解南苏关系二十年前所发生的事件，也就是说，了解作为某些事件的参加者之一的本人对这些事件的看法。我相信，别的人也对这些事件有兴趣，虽说老一代的人早就知道，当时的某些重大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是如何收场的，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

《莫斯科的岁月》的问世可能对理解南苏关系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有所裨益。这又只会有助于进一步加强独立和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的爱好和平和不结盟的政策。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于伊加洛疗养院

目 录

作者的话	1
赴苏前夕	1
清除过去的陈迹	16
克里姆林宫的晋见	26
南斯拉夫政策中的“不正常做法”	48
铁托访问苏联	63
莫斯科宣言	80
莫斯科和匈牙利的政治危机	97
围绕苏伊士运河的危机	117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南斯拉夫的秘密信	134
铁托和赫鲁晓夫访问克里米亚	146
一九五六年秋天的匈牙利事件	161
暴风雨般的一九五六年十一月	185
铁托十一月十一日在普拉发表演说	205
南苏关系恶化	230
在克里姆林宫迎接新年	252
中国的调解作用	266
关于苏共中央二月全会	280
对南斯拉夫提出新的指责	291

苏联政府的现行政策	308
尼·谢·赫鲁晓夫的地位加强	325
中国和蒙古之行	338
南苏关系改善	349
一九五七年六月苏联最高层的一场较量	367
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以后	390
铁托和赫鲁晓夫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和 二日的会晤	405
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 朱可夫元帅被撤换	423
庆祝十月革命和莫斯科各国党的会议	441
又一个岁暮时节	459
苏联继续展开“和平攻势”	478
第二次去蒙古	496
围绕南共联盟新纲领同苏联发生冲突	516
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 莫斯科和 贝尔格莱德的关系激化	535
取消信贷协定	556
纳吉·伊姆雷遭杀害	573
近东出现危机的苗头	592
离开苏联前夕	609
向尼·谢·赫鲁晓夫辞行	619
写在“完”之后	643

附录：韦利科·米丘诺维奇向《文学语言》杂志

发表的谈话

——《莫斯科的岁月》一书作者回答问题.....653

赴 苏 前 夕

南苏关系正常化后贝尔格莱德的气氛。南斯拉夫这颗政治明星仍在上升。南斯拉夫领导的团结。贝尔格莱德的辞别晚餐。

一九五六年三月七日，贝尔格莱德。

过两个星期，我就得动身去莫斯科，担任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的职务。这是铁托总统和我们领导在南斯拉夫同苏联的关系正常化以后作出的决定。

我不知道，在莫斯科等待着我的一切是什么。早自一九四六年起，我就在我国政府不同的政治机关里主管南苏关系，已有十来年时间，同志们认为，我很了解在莫斯科等待着我的工作，认为可以依靠我。直到前不久，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随着我启程的日子日益临近，对我来说，俄国越来越象一座我不认识的笼罩在云雾中的高山。

在这件事情上还有一种特殊的因素，一种不只是同上路前的旅客怀有的忐忑不安心情有关的因素。我过去十来年所做的工作同莫斯科正等着我的工作这两者之间就我的地位而论，有着重大的区别。在这里，我是南斯拉夫这个大集体的一员，这个集体，理所当然地使每一个人得以发挥最大的个人积极性，同时又使他在工作中免犯大的政治错误。在作出涉及南苏关系的决定的过程中，“上面”和“下面”都有许多把守严密的关口。我们这里有数以

十万计的人参与这件事，照例使人不至于在政治上“走上歧途”。现在对我来说，一切都将是另一副样子。在莫斯科，我将处在突出的阵地上，而且不是作为行将发生的事件的旁观者。

对于我们和俄国人来说，现在需要的干部不同于这几年来我们和他们都大批拥有的那种干部。我们现在需要的人，要能够保证把我们去年六月庄严地宣告的正常化政策付之实施，要懂得和能够照“新精神”办事，而不是老是按“旧章法”办事。好几年来，数百万南斯拉夫人，几乎是我国全体人民参与了我们苏联侵略政策的抵制。我们有数以千计的人在这场斗争中表现突出。基本上我自己也是这一类“专家”之一，而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另一类的专家，正如他们曾经成功地同俄国人进行政治斗争那样，他们至少懂得同样成功地同俄国人合作共事。

我认为，有若干原因使得我们在这方面的处境要比苏联好得多。是俄国人把冲突强加于我们，而不是我们强加于他们。从冲突的第一天起，一直到斯大林去世时为止，以及包括后来，南斯拉夫曾多次建议结束冲突，在平等、独立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合作。过了好几年，一直到斯大林死了，甚至在这之后又过了两年多时间，他的继任者才接受南斯拉夫的这些建议。

最后，南斯拉夫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小国，而苏联是世界两个超级强国之一，南苏两国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和合作的基本概念和感情是不同的。在南斯拉夫这样的小国，这种感情是很强烈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是小国这样一个不幸的事实。象苏联这样的大强国，追求平等的感情是很微弱的，或者根本就没有这种感情，因为它们由于是大国而不需要这种感情。

现在在南苏关系上这一切都在双方经受考验。我们得恢复合作和我们之间的信任。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跟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一样，建立要比保持来得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也好，在国

与国之间也好，如果一位伙伴滥用了这种友好关系并弃之如敝屣，就象斯大林一九四八年对南斯拉夫所做的那样，那么这种友好关系是很难恢复的。因此，南苏关系的正常化迈着小步子，以缓慢的速度取得进展，经过很长时间才达到我们去年六月间的“和解”。

铲除斯大林给他的继任者们留下的，特别是在南苏关系中留下的废墟的工作，是由斯大林的继任者们主持进行的。南斯拉夫人在这上面，即便在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的关系上也是爱莫能助。钥匙仍然在俄国人手里，斯大林死后的两年内，大门只打开到俄国人愿意打开的程度。不过，在南苏关系正常化以前的时期内，气氛已经发生了变化。多年来强加于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战争悄悄地停止了，俄国人一停止对南斯拉夫的攻击，未经商议就出现了暂时的平静和停战。一九四九年以后，我们第一次互派大使以来，已经有两年时间了。

下面这一点表明了我们之间的私人的关系怎么样，且不说官方的关系如何了：从一九四九年秋天以来，在贝尔格莱德也好，在莫斯科也好，在联合国也好，在我们见面的其他一切地方和政治场合也好，俄国人跟我们连话都不说。他们在见到我们的代表时，连招呼都不打。唯一的例外是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在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在两国外交部里递交和拒绝接受抗议照会时，而这一活动几乎成了我们驻莫斯科大使馆和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留下的一小批低级职员的工作。

鉴于俄国人许多年来把这样的关系强加于我们，我认为，我们驻莫斯科代办D.久里奇所遇到的一件事就不足为奇了，据我记得，这件事发生在斯大林于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死去后的两三天内。苏联外交部的一位副部长雅可夫·马立克向我们的代办伸出手去，后者当时正同一批外国外交官就（苏联蒙受）最沉重的损失向马立克表示悼念。马立克同我们的代办握了手这件事，我们的

代办用密电报告了南斯拉夫政府，因为苏联官方的一位代表在公开场合同南斯拉夫的代表握手，这的确确是件大事。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日，贝尔格莱德。

南斯拉夫政府决定指派我为驻莫斯科大使，这肯定不会使苏联政府高兴。俄国人总是把其他国家，特别是南斯拉夫的共产党领导人划分为亲苏派和反苏派。我觉得，照苏联人的评价，我早就属于那第二类人，虽说我认为，俄国人在这一点上并不对。

在我还是一个孩子，还在我的故乡——黑山的韦莱斯托沃村的时候，俄国便是作为黑山人的朋友和“保护者”为我所知道的第一个国家。后来，我从书本上读到，沙皇俄国从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时代起，一直到十月革命时为止，始终在援助黑山这个巴尔干的第一个自由国度，俄罗斯帝国的忠实盟邦。我还很早就了解到，许多代的黑山人一生都觉得自己不仅是俄国的忠诚友人，而且是俄国沙皇的最忠实的臣民，把俄国沙皇看成自己反对奥斯曼帝国的长期解放斗争中的强大保护人。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久远的过去，发生在我们的社会中出现马克思，接着是出现列宁和共产党人之前。

我这一代人只能是，也确实是，双倍地亲俄国的，因为我这一代人是在黑山这种强烈的亲俄国的悠久传统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多少世纪以来，黑山一直是同自己的“俄国保护人”联结在一起的。十月革命的思想和胜利，使得这种联系获得了新的内容和力量，可以说是得到了新生。因此，在俄国的内战还在进行的日子里，十月革命和我们共产党的思想在黑山很快就为人们广泛地接受，就不足为奇了。黑山的这场运动的参加者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我们当时几乎还没有工人阶级。

在后来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气氛中，我于一九三四年，在我十

八岁的时候，作为策提涅的一位中学生，参加了地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好了，关于这些，我就不再写下去了。我只想说，从那时起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我们同苏联政府的代表发生最初的一些冲突时为止，我跟绝大多数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一样，觉得苏联是自己的第二祖国，几乎是一个崇高和神圣的地方。我在想到和谈到斯大林时的那种激情不亚于苏联和世界上的他的千百万信徒中的任何一个人。我现在想起了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七日，我作为游击队洛夫钦支队的政委拍给斯大林的一封电报，当时，我们的解放战争和苏联反对法西斯征服者的卫国战争正处于紧张关头。我手头没有这封电报，战后，我们的一本人民解放斗争文件集中曾发表过这封电报。我清楚地记得，就内容也好，就措词也好，它都象是信徒在祈求上帝：你，总揽一切者，缔造者……全是这样的调子，象一篇誓言或者象一篇祷文。

不过，这种激情在我身上早在战时，特别是战后不久就减弱了。在我们同俄国人发生冲突之前很久，我在贝尔格莱德同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的代表的正式会晤越来越不愉快。在这方面，俄国人很早就预示了将于一九四八年降临我国的那场风暴，虽然我们当时未能相信其中的许多迹象。

一九四八年六月底，斯大林把南斯拉夫开除出“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和各国共产党“大家庭”的消息，成了最轰动的政治事件，传遍了全世界，那时我们在南斯拉夫召开了著名的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有点象是国家在面临战争时才采取的总动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也发了言。我的发言不完全符合我们党的领导人的讲话精神。我的发言片面性大一点，更加尖锐。但是，连我自己也认为，我的发言的薄弱的一面是对苏联的尖刻，这在一九四八年七月却在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受到热烈的欢迎，并被人们所接受。第二天我们获悉，苏联代表把我在大会上的发言看成是证明

南斯拉夫奉行反苏方针的一个证据，而他们以前就在指责我们奉行反苏方针。

我们同苏联发生冲突后不久，我被调到外交部。在外交部，一九四九年以及一九五一年我被指定参加代表我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议的南斯拉夫代表团。这些会议对于我们来说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因为南苏冲突当时处于世界公众瞩目的中心。

一九四九年，在纽约举行的会议上，我们提出了南斯拉夫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问题。我们认为，对于维护我国的安全，对于制止斯大林使用苏联的军事力量来反对我国来说，这次选举具有极大的意义。当然，俄国人跟我们一样清楚地明白这一点。因此苏联代表团一九四九年竭尽所能阻止南斯拉夫选进联合国安理会。我们当选的话，等于苏联在同我国的冲突中政治上遭到失败。苏联代表团团长是安·扬·维辛斯基。他对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的代表团的态度最为恶劣。我想象，在莫斯科三十年代对布哈林和被弄死的苏联其他领导人的骇人听闻的审讯案中，维辛斯基作为斯大林的国家检察长的行为，大概跟那时对我们的态度差不多。在联合国大会这次会议上，苏联在同南斯拉夫的冲突中遭受了惨败，因为南斯拉夫被选进了安理会。

我们不得不进行的这场斗争给我国代表团以及给在南斯拉夫的我国最高政治领导留下恶劣印象的，不只是苏联以前的国家检察长安·扬·维辛斯基的态度。这一点，我们是可以料想到的。使我们感到失望的是，英国代表团投票反对把南斯拉夫选进安理会，而赞成苏联提名的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当时执政的是工党政府，由贝文大臣代表工党政府出席联合国这次会议。贝文大臣这么做，似乎是想确认一条老的原则：英国的朋友也好，敌人也好，都不是永恒的，唯有英国的利益是永恒的。温斯顿·丘吉尔本人在英国议会尖锐地谴责了英国代表团在安理会采取这样的态度。

在一九五一年于巴黎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另一次会议上，我们同苏联的冲突正式国际化了并完全表露在外。我们指控苏联对南斯拉夫奉行侵略政策。应南斯拉夫的要求，这一点作为特别的一项列入了大会政治委员会的议程。我国代表团团长是爱·卡德尔，而密·吉拉斯^①是我们驻政治委员会的代表。他发了言，代表南斯拉夫在联合国这个崇高的讲坛上指控苏联。联合国政治委员会绝大多数代表支持南斯拉夫的立场。在投票表决时，苏联完全孤立并被击败，总共只有东欧国家五票站在它一边。

从一九四八年起，俄国人就竭尽所能，防止我们的冲突所谓国际化，竭力让其他国家，首先是让西方各大强国认为，这场冲突不过是共产党家庭内部的争吵，应当让作为家长的苏联去解决。我们的观点则从一开始就相反。在联合国大会会议上，先是一九四九年在纽约，继之是一九五一年在巴黎，南斯拉夫作为一个国家在这个最高“世界法庭”上取得了对苏联的最重大的政治胜利。

两年以后，要我代表南斯拉夫政府前往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我想这是在一九五三年三月八日，就约·维·斯大林去世表达南斯拉夫官方的悼念。当时我们同苏联的外交关系只保持在代办一级。

在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里，我见到了这位代办，我记得他叫祖鲍夫。按照惯例，他穿一套黑衣服，眼睛红肿，很可能是由于哭泣或者失眠，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一间挂着一帧四周蒙着黑纱的斯大林巨幅像的房间里，他合乎礼仪地、几乎是热切地接待了我。我按照礼仪规定，代表南斯拉夫政府说了，几乎是慷慨激昂地说了表示悼念的话，但是连我自己都感觉到，听起来，这不仅不

① 按“吉拉斯”以前被误译为“德热拉斯”。在塞尔维亚文中，为Ђилас，拉丁化写法为Đilas或Djilas，Dj系一个字母，被误以为两个字母，遂被误译为“德热拉斯”。——译者

象是悼念，倒有点象对发生了可庆幸的事件表示祝贺的味道。既然在我看来尚且如此，我可以想象，在祖鲍夫的耳朵里听来会是怎样。我没有打算让这一切搞成这副样子，尤其是我没有打算亲自伤害祖鲍夫的哀伤的感情，但是，要让南斯拉夫对苏联政府的正式悼念变成另一副样子，变得好一些，要有所作为已经晚了。

一九五五年春天，我们等待苏联代表团抵达贝尔格莱德，我们在外交部起草了一份文件草稿，准备作为我方的方案同尼·谢·赫鲁晓夫率领的代表团讨论。一九五五年五月中，我们在爱·卡德尔家里开会，会上我们讨论了这个稿子。这个会，我们开了一整宵。据我记得，到会的还有亚·兰科维奇、科查·波波维奇、韦·弗拉霍维奇和米亚尔科·托多罗维奇等同志。我们一致认为这个方案是可行的，但只适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个文件后来以《贝尔格莱德宣言》的名称出了名，俄国人基本上接受了，虽说对它并不满意。

这一切俄国人都知道，关于我在我们这十年的冲突期间的工作，还有许多事情，他们都知道。关于我对我们的关系的看法，他们也得到详细的报告。我丝毫不怀疑，俄国人对于挑选我当南斯拉夫驻苏大使是不满意的。这种情况决不会方便我在莫斯科的任务。但是，我认为，即便如此，我们仍又以平心静气处之，因为“不打不相识”吆。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二日，贝尔格莱德。

我昨天写下的这一切，今天在我看来都是多余的；思路老是把

我拖回到过去，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迹象。

我们同俄国人一起郑重其事地宣告了刀枪入库，接受了我们两国间关系的正常化，在《贝尔格莱德宣言》中“黑字写在白纸上”，为我们两国现在和今后的关系确定了新的政治基础。但是，问题

在于俄国人对这是怎么看待的，因为《贝尔格莱德宣言》出自南斯拉夫夫人之手。俄国人同我们一起签了字，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变得越来越清楚的是，他们和我们对此仍然有不同的想法，尽管我们在同一个文件上庄严地签了字。

根据对苏联现行政策的观察，不难看出这种差别。我们把《贝尔格莱德宣言》看成是某种社会主义的“大宪章”，它应当适用于南斯拉夫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如果不象英国大宪章保持那么久远，无论如何也该保持好多年。从种种情况来判断，俄国人把这一文件看成没有什么特殊的持久意义的有关两国眼前事务的一时的条约。

我们认为，南斯拉夫通过《贝尔格莱德宣言》在同苏联这个“第一个和居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在走向平等和独立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而且这不仅是为了它自己，也是为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即令仅仅在潜在的意义上是这样。从俄国人的表现来判断，他们的想法不同，他们认为，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可以奉行一种政策，而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则可以奉行另一种甚至是相反的政策。

从我们所了解的种种情况来看，俄国人认为，《贝尔格莱德宣言》是一个很差劲的文件，因为它是“国家”性质的，而不是“党的”性质的，因此需要尽早用一个新的、比较好的文件来替代它。这个新文件将在莫斯科写成，出自苏联人之手，这一点本身就会使新文件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在俄国人看来，《贝尔格莱德宣言》离开这种精神有十万八千里之遥。他们在上面签了字，因为他们不想两手空空回莫斯科，但是意味深长的是，赫鲁晓夫作为代表团团长却拒绝在上面签字。代替他的是布尔加宁，他以总理的身份签了字。